



It is now possible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whether the essays that constitute *The Soul and the Forms* have, and can have, a unity. If the question is taken to mean whether they form a complete system, to be judged solely in terms of truth and falsity, the answer is clearly 'No'. On the other hand, Lukács also views the essayist as a kind of John the Baptist, a forerunner, and says that what is to follow him is a great aesthetic system. So it might be said (though Lukács does not say so expressly) that the essays which constitute *The Soul and the Forms* at any point towards a unity, the unity of the system that is to come.

[英] G.H.R. 帕金森著
翁绍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IRG LUKÁCS

格奥尔格·卢卡奇

GEORG LUKÁCS

格奥尔格·卢卡奇

[英] G.H.R. 帕金森著

翁绍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建纲

格奥尔格·卢卡奇

(英)G. H. R. 帕金森 著

翁绍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933-4/B·252

定价 14.50 元

序 言

本书是陈述而非批判的论著。它试图概述卢卡奇的观点,说明它们与他那时代的文化传统有着怎样的联系;而并不去评论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缺少批评也许会被看成是一个缺憾,但我以为还是要有一本单纯陈述卢卡奇的书。有句老话(尽管总是说管说、做管做),在批评一位作者的观点之前,应该先设法去理解它们。有时候,包括卢卡奇的观点在内,要取得这样的理解是不容易的,而陈述者就负起了一项有益的责任。其次,卢卡奇是自成体系的著述家,一旦陈述了他的体系,辨明了它所假设的前提,以及弄清楚命题之间的联系,这个体系的缺漏也许就不难发现。

我曾说过,理解卢卡奇的著作并不容易。读者面临两种困难。卢卡奇早年著作的文体常常是晦涩的;某些早期作品近乎散文诗,他最有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大量充斥着最艰涩的哲学家黑格尔的语言和思想。卢卡奇后期著作虽以明白清晰的文体写成,但即使如此,读者也面临着困难。由于卢卡奇著述庞杂枝蔓,这样至少经常混淆了他思想的总体结构。要想对这一结构作概括的论述,就必须删繁去芜,也许有

时会被认为，删去的比较重要，未删去的反倒不那么重要。不过，尽管这本书有缺憾，希望它还是能对卢卡奇的思想领域有所提示，从而使读者产生自己去钻研卢卡奇的愿望。

有些读者希望本书能促进他们深入研究卢卡奇，为帮助这些读者，我提供了大量注释，它们大多是由原著提供的。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卢卡奇思想概况的读者，那么对这些注释可以置之不理。本书所引的卢卡奇原文是由我自己翻译的。这主要是考虑对卢卡奇专用术语的译法能取得一致，而未必表示对目前的英文译法有什么不满，它们中有的译得不错，有的还相当出色。

G.H.R. 帕金森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卢卡奇的生平和时代	(1)
第二章 前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灵魂和形式》 与《小说理论》	(2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历史和阶级 意识》	(5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史:《青年黑格尔》与 《理性的毁灭》	(8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评论I:西方文学	(120)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评论II:俄国文学	(162)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审美特性》	(186)
第八章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213)
文献目录	(237)

第一章 卢卡奇的生平和时代



卢卡奇被公认是本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观点得到有力的辩护,但更经常的也许是同样有力的攻击。本书的目的既不是攻击卢卡奇,也不是替他辩护,而是希望能清晰地阐明他的主张,阐明这些主张是怎样展开的,这有助于对他的了解。

卢卡奇也许会说,倘若要了解一位作者,应当把他置于他的社会和历史联系之中,任何对卢卡奇的一般研究也应当将此作为它的首要任务。1885年4月13日,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是有钱的银行家约瑟夫·卢卡奇(József Lukács)的次子。双亲给他取名“György”,但现在提起他,更常用德文名字“Georg”。这样做不止是方便,更有它可取的地方。事实上,卢卡奇娴熟德语和德国文化。父亲将自己的姓由德语卢文格(Löwinger)改为匈牙利语卢卡奇(Lukács);母亲未婚时的姓是韦特海默尔(Wertheimer),她在维也纳受教育,结婚后不得

不学习匈牙利语。^①不过,在家中还是用德语,卢卡奇的大多数著作最初也用德语写成,据说,他实际上还不能用匈牙利语写哲学著作。^②然而即使这样说,仍应当考虑到,卢卡奇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匈牙利人,^③而且,他毕竟是在匈牙利首都出生和受教育的。因此,要了解他的话,就应当首先把他与当时的匈牙利联系起来。

在卢卡奇青少年时代,当时的匈牙利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国王住在维也纳,而国会设在布达佩斯。自由主义理想被广泛承认,但公民权却非常有限,政府只关心极少多数人的利益。占人口少数的贵族占有巨大的财富,低于贵族的那一等级被称作“上等阶层”,他们组成了官僚政治。政府也照顾到人数众多日益壮大的犹太中等阶层。卢卡奇的父亲就是这些中等阶层犹太人中的一员,他从低微的地位晋升到匈牙利信用大银行的总经理,因为他的贡献而受到政府的表彰。可以说,中等阶层是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而上升的。1900年,在匈牙利的2000万左右的总人口中,大约有30万产业工人;到了1910年前后,产业工人的人数已增加到50万以上。不过,农民在国民经济中还是占优势,本世纪初大约有380万农业工人。

贵族和上等阶层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层阶级中有许多人与他们达成共识。父亲的商务活动使年轻的卢卡奇接触到这种共识;他对此全然拒绝,并且(像他后来所说)对“整个匈牙利官场”很早就有强烈的反感。^④当然,在这方面也不光是他一人。在向贵族和中间阶级的价值观提出挑战的其他人中间,就有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前,该党党员总数不超过5万人,这个小党传播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它是

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它致力于要求提高工资和改进选举权。不过,在青年卢卡奇的生平中,对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一些知识界杂志,它们不附属任何政治党派。其中有1908年创刊的文学杂志《西方》(Nyugat)。卢卡奇在1908年到1917年期间经常给这家杂志撰稿,有些文章后来收入他首次在这里出版的《灵魂和形式》(The Soul and the Forms)一书中。就像《西方》的刊名所暗示的那样,“它反对匈牙利沙文主义,并赞成眼光向外的欧洲人的匈牙利”。它攻击所有艺术上的俗套,但也不是一切撰稿人都带有激进的政治观点的;事实上,有些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不过,至少有两个人是激进的,那就是小说家日格蒙德·莫里兹(Zsigmond Móricz)和诗人安德烈·奥第(Endre Ady),他们是匈牙利现代文学中两位最杰出的人物。卢卡奇后来说,奥第的诗对他有决定性影响,它们不与现实妥协,而与现实抗争。^⑤在青年卢卡奇的生活中,《二十世纪》(Huszadikszázad)杂志也颇为重要,它创刊于1900年,创刊后不久就被社会科学协会(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选定为它的刊物,社会科学协会是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卢卡奇早期有许多文章刊登在1906年到1918年的《二十世纪》上。

这就是卢卡奇青少年时期匈牙利的社会环境。他从1902年到1906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学(jurisprudence);在这段时间内,这位大学生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作剧本(后来被他销毁),并协助建立一个旨在把现代戏剧带给工人阶级的戏剧团体“the Thalia”。^⑥然而,匈牙利远不能满足卢卡奇,从1906年起,他在国外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学习生涯。尽管他有法学的第一学位,但这门课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出

于父亲的意愿；他的真正兴趣是在社会学和哲学，特别在美学。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社会学的两位主要人物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齐美尔在柏林执教，而1906年到1907年，卢卡奇正在柏林用匈牙利语写他的处女作《近代戏剧发展史》(*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rama*)^⑦的初稿。该书将近代戏剧与社会学理论相联系，这是属于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尽管卢卡奇要在1909年到1910年才参加齐美尔的讲课和讨论。齐美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自己的体系中采纳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⑧后几章中(第三章)将看到，在卢卡奇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见到他的影响。

卢卡奇从1912年到1915年住在海德堡，他在那里遇到当时另一位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但首先促使他留在那里的是对哲学的兴趣，而不是对社会学的兴趣。这段时期内，新康德学派在德国哲学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些哲学家试图运用康德思想去解释因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兴起而使哲学困惑的问题。卢卡奇早就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见于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灵魂和形式》，该书在1910年用匈牙利语出版，1911年又出版了德语增订版。^⑨新康德学派有两个主要中心，一个在马堡，另一个在海德堡。马堡学派致力于自然科学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那托普(Natorp)和库恩(Cohen)；海德堡学派或称西南学派致力于历史哲学，领袖是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考虑到卢卡奇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去海德堡学习。在海德堡他听了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讲课，还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结成好友,拉斯克的思想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

在海德堡,卢卡奇从事美学问题的写作,并在1914年完成了《艺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t*)的书稿,这是他早在三年前就着手的。但他对哲学的看法正在改变,他抛弃了《艺术哲学》,并在1915年重新拟订草稿,他称之为《美学》(*The Aesthetics*)。在这两部书稿之间还有1914—1915年冬季的作品:《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这部著作初版于1916年,卢卡奇从此离开康德哲学而趋向黑格尔哲学。^⑩黑格尔哲学热的兴起是由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激发起来的,他的论述黑格尔青年时代的著作在1906年出版。狄尔泰本人完全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像黑格尔一样,深切地关注历史,在《小说理论》中,也能找到卢卡奇与该思想学派的观点有联系的地方。^⑪

这本书是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极度郁闷的心境中写作的。卢卡奇把德国人最终胜利的前景看成是一场恶梦;但诚如他后来所说,要是德国人失败,“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谁又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⑫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多少使卢卡奇从绝望中醒悟过来,^⑬但他并没有马上采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步骤。

二

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是战争结束后的事情。^⑭轴心国战败后,哈布斯堡政权随着1918年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的建立而垮台,共和国首脑是前反对党领袖米哈伊·卡罗伊(Mihály Károlyi)。共产主义者贝拉·孔(Béla Kun)和他的一些

同志都是俄国的战俘，他们在第二天到达布达佩斯，旨在组织一个共产党。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建立；卢卡奇在12月2日加入该党。他的转变显得太突然，出乎他的朋友意料；正如其中一位朋友¹⁵所说，“在两个星期天之间，扫罗(Saul)成了保罗(Paul)。”* 但尽管太突然，这决定本身并不是轻率的。在参加共产党前不久，卢卡奇写了一篇题为“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¹⁶他在文章中说，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必须作一个选择，而这成了一个道德两难推理(dilemma)。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起努力，意味着同不赞成结束压迫的社会民主主义宗旨的阶级和政党一起努力。共产主义者同样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宗旨，并在这方面容不得去妥协。但加入到他们中间又意味着接受用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观点，它意味着选择恐怖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这就是两难推理的抵触，卢卡奇指出，要在它们中间作选择，纯然是信仰的问题。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卢卡奇相信善不可能来自恶；一个人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说的)对他达到真理的方式说谎，出于这个理由，他拒绝了共产主义。不久之后，他又接受了共产主义，不过，不应当认为卢卡奇这位共产主义者最终相信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在《策略和伦理学》(*Tactics and Ethics*)(写于1918年12月以后、最晚不迟于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一本小册子)中，卢卡奇指出，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要讲慈善就不可能行动，而革命所处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局面。¹⁷

* 据《圣经·新约》，扫罗早期迫害耶稣门徒后皈依耶稣，受洗后改称保罗——译者注。

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因是复杂的。理智信服马克思主义(他从1902年起就断断续续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卢卡奇后来说,^⑭他是出于道德的动机,这在他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许多作品标题可以证实这一点,比如《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1919年),《策略和伦理学》(1919年),《共产主义生活中道德的作用》(1919年)以及《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年)这样一些标题。这些最终能表明卢卡奇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动机;其中,^⑮他说到共产党的自身纪律,它的兄弟般关系的理想,真正的团结和自我牺牲。除了这些动机外,还可加上卢卡奇后来所说^⑯的“藐视憎恶”,从年轻时,他对资本主义生活就产生了这种感觉。

卡罗伊政府试图奉行赞成协约国的政策,但协约国认为,匈牙利应当为它偏护德国付出代价,并坚持大幅度压缩它的国境线。在1919年3月30日提交给匈牙利一份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所谓“Vyx note”——之后,卡罗伊政府辞职,它的赞成协约国的政策也随之破产。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形成一个新政府,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共产主义者谈判。双方的协议在3月21日签订;一个新政府产生了,并宣告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在新政府中,共产主义者所任职务有名无实,常常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职务。比如,卢卡奇担任共和国教育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则是日格蒙德·孔菲(Zsigmond Kunfi),他早先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社会主义》(*Socialism*)的编辑。但不论他们的职务地位怎样,通常还是认为共产党人在掌权,孔菲就肯定有这种看法,他说,3月21日的协议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向共产党人投降的条约。^⑰接下来的几个月,对卢卡奇来

说,是非常活跃的时期。他着手一项重建教育的宏伟规划,他还作为正与入侵的罗马尼亚军队对峙的第五师政委视察了东方前线。不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了133天。它的军队在对付捷克人的北方战线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阻挡不住罗马尼亚人向布达佩斯的推进。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末日降临,很快就被阿特米拉·霍尔蒂(Admiral Horthy)的右翼政权所代替。8月和9月,卢卡奇还留在匈牙利从事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9月底不得不偷渡出国。

他到了维也纳,有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流亡在那里,他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29年。在这期间,他似乎离开了维也纳文化生活的潮流。作为居住在维也纳的一个条件,匈牙利流亡者被责成不得过于密切地卷入奥地利事务,但不管怎样,卢卡奇在当时非常关心匈牙利共产党的内部政治活动。^②尽管遭受挫折,匈牙利共产党人丝毫没有绝望。他们相信,伟大的革命浪潮并未因匈牙利最近的事件而平息,它不久将席卷世界,达到社会主义,或者无论如何将会席卷整个欧洲。卢卡奇后来指出,^③《共产主义》(*Communism*)杂志表达了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心情,卢卡奇是该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只从1920年办到1921年,它奉行极左翼路线,并宣告一切根源于资产阶级世界的制度的总崩溃。所以,卢卡奇在《关于议会制度问题》(*Zur Frage des Parlamentarismus*)^④一文中说,共产党人不应该加入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论点同年受到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严厉批评。在卢卡奇看来,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同样还表现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一书中,该书1923年在柏林出版,他后来认为,这本书是他对大战最后几

年的发展时期的概括和终结。^{②⑤}

三

这本书对共产主义团体有巨大的影响,尽管卢卡奇似乎不希望有那种影响。^{②⑥}卢卡奇的一些朋友和熟人支持它,特别是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卢卡奇初次遇见他还是在德国做学生的时候;以及约瑟夫·勒万(József Révai),他是最早的匈牙利共产党员。^{②⑦}但有更多的大人物扬言反对它,其中包括有影响的俄国哲学家德波林(Deborin),而最重要的是季诺维也夫(Zinoviev)。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领袖,是列宁死后不久控制苏联的三人集团的一员。在1924年6月到7月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上,他发起了对极左理论的攻击,就在这期间,把《历史和阶级意识》指责为“修正主义”,说它提出了有损共产主义事业的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②⑧}不过,尽管季诺维也夫是令人生畏的对手,但并没有后来斯大林那样的权力,所以没有直接强迫卢卡奇公开认错。卢卡奇没有回答对这本书的攻击,只是在1925年与1926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偶尔提到这本书^{②⑨}时暗示,他不急于去否定它;这一否定是后来作出的。

从1923年《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发表到1929年他离开维也纳期间,卢卡奇发表的著作不多,而且这些著作大多是应时作品(pièces d'occasion)。最重要的有192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列宁的论文,以及两篇关于马克思同时代人著作新版的有份量的评论文章——《社会民主主义者费迪南德·拉萨尔》(1925年)和《哲学家莫泽斯·赫斯》(1926年)。卢卡奇像这段时期

那样成果稀少是不常见的,其原因在于他更多地忙于党的事务。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建立于莫斯科,由贝拉·孔领导,他在1921年成了共产国际的高级官员,并得到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另一个团体建立于维也纳和柏林,由耶诺·兰德勒(Jenő Landler)领导,他以前是工会领导人,1919年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府成员。卢卡奇认为孔试图把官僚统治强加给党,并与勒万等人一起参加与此对立的兰德勒团体。

孔集团和兰德勒集团之间的斗争对研究卢卡奇的思想大多无关紧要,不过,1928年发生的事件促使卢卡奇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匈牙利共产党会议将在1929年举行,卢卡奇从1928年起就为这次大会准备政治论文。这些论文以“勃鲁姆(Blum)论文”著称,因为卢卡奇当时使用这个笔名,^④它们都遵循在该年去世的兰德勒的思想。论文涉及党应为之努力的政府形式。卢卡奇指出,匈牙利的状况还不可能使它由霍尔蒂政权直接前进到依据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党应当致力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些提法在卢卡奇的党内同志听来似乎过于荒谬。孔集团谴责其为“机会主义”,卢卡奇所在的集团也只给以冷淡的支持。据说,孔还准备将他开除出党,卢卡奇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1929年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他私下还作了一次性质不同的自我批评。最终他认识到,即使他自信是完全正确的,也无法说服别人同意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太缺乏实际政治的能力。于是,他决定退出政治舞台,重新致力于理论问题。

卢卡奇后来说,勃鲁姆论文促使了他的观点的根本转变,他因此把1928年看成是标志他的马克思主义见习期(Lehr-

jahre)的结束。就论文本身而言,并没有明显的观点转变,但卢卡奇后来作了如下的表述。首先,他开始克服了二元性,从战争的最后几年起,他的思想就带有这种特点,在他看来是指在革命的善和资产阶级的恶之间的二元性。^⑩其次,他开始克服自己早期看法中的抽象性,并“第一次从现实本身得到提示”。^⑪

四

到目前为止,卢卡奇的理性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于1919年结束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于1923年结束的“以救世主自居”阶段,和于1928年结束的过渡阶段——这也是卢卡奇本人所承认的。卢卡奇未必会承认他后来的理性生活可作进一步的划分;他确信,在1928年以后,他的方法是正确的,因此余下的问题就是去运用这种方法。不过,从勃鲁姆论文发表到他逝世的这些年,不难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只是这一划分所使用的不是政治尺度而不是学术尺度。照此看来,从1929年到1943年他流亡之后回到匈牙利这段时间是卢卡奇一生的第四阶段。从1943年到1956年,也许可以认为是第五阶段,在这阶段,卢卡奇参加了1956年革命,并再次离开匈牙利流亡;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包括他1957年流亡后返回一直到1971年去世。

卢卡奇在1929年离开维也纳,翌年去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在那里,他得以研究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稿。他说,阅读这部著作——现在因其有关异化的观点而闻名——使他能够把《历史和阶级意识》